第一章　赣东北根据地革命与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

（1927.8——1931.8）

第一节　赣东北早期革命述略

在闽浙皖赣省交界之处，群山绵延，地势险要，武夷山脉从西南横贯东北，雄居闽赣边界，黄山独耸皖赣之边，控制四省通衢，而这一区域中间是怀玉山和磨盘山；滔滔长江是它的北面屏障，这纵横五百里之地，便是闻名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赣东北（闽浙皖赣）苏区，是当时六大根据地之一。

赣东北物产丰富。山峦崇岭盛产木、竹、茶及香菇等特产，埋藏着丰富的铜、铁、铅、锌、煤、硫磺之类矿产资源，浩渺的波阳湖鱼虾成群，山地水田稻花飘香。然而在黑暗的北洋军阀的统治下，这片鱼米之乡的广大农民却过着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沉重的封建军阀统治的枷锁，紧紧套在穷苦农民的脖子上，租税徭役、高利贷缠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据1927年11月波阳党团组织对乐平县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查来看："土豪(包括地主)约占20%,他们少则有500亩,多则超过1000亩自耕农拥有20至50亩土地,占人口40%；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占40%；上饶、铅山、横峰、贵溪四县的地主、富农占总人口9.5%,却占有71%的土地，占总人口90.5%的贫苦农民，则只有29%的土地。"① 弋阳县的地主豪绅约占

①参见《赣东北革命史》第一章第一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口的 5%，占有 80%左右的土地，这还不包括 10%左右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公田”。① 闽北情况也基本相似，如崇安县的地主占有全县 44万亩土地的 80%以上，其中万、邱、朱、潘四姓大地主占了绝大部分。② 曾归于闽北的铅山县，9%左右的地主占了 70%的土地。③ 显而易见，赣东北地区（包括闽北）的绝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控制着。我们再举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弋阳县大港乡 300户,共计人口 1060人,有田 1520余亩,地主 3户，占田 1150亩，计 75.65%；富农 5户，占田 190亩，为 12.5%；其余农民 292户，1020人左右，合计占田才 180亩，为 11.85%。④ 铅山县石垅乡、下渠乡都是地主占 80%左右的土地，而且集中在一些大地主手中，如石垅乡的王永丹、王伯贵、林子瑶三户土著地主，外乡的地主杨树秦家、长沙坂许家、篁碧雷家，六家瓜分石垅乡的田地约 80%，达 900余担谷的地租。⑤ 德兴县的土地、山林也集中在黄柏圹、港西、新营、张村等地的大地主徐大亭、舒老二、洪观光等人手中。⑥

缺田少地的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地租田赋。从整个闽浙赣地区来看，地主豪绅采取收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定租制，又称铁板租，就是地主与农民签定租额，无论年景好坏都要按此交纳地租，颗粒不能少；二是分成制，即按照实际收成的比例来交租，一般是“四六”分成，即农民得四成，地主得六成；最高是“三七”分成，那么农民收入更少了。当然，少量也存在“对半”分成的方法，不过这大都是山垅的低产田。⑦ 当时，一般的土地每亩

①《弋阳苏区志·概述》。
②《崇安党史丛书》1985年第 5期第 1页。
③《铅山革命斗争史》第 5辑第 2页。
④《弋阳苏区志》第 82页。
⑤《铅山革命斗争史》第 5辑第 1页。
⑥《德兴革命斗争史》第 9页。
⑦《德兴革命斗争史》第 9页。

收约 300 斤稻谷，那么大概要交 200 斤。①

除规定的地租之外，附加地租名目极多，这是农民的一项额外负担。例如，送交地租时另送 4 只鸡蛋，称为“压租礼”；租五亩田以上要交大母鸡 1 只，称为“年敬”②；新租地主土地者每亩要交 1 担谷的“插牌礼”，另交 8 到 10 元（银元）的“预收压金”；还有开镰前要备“看禾饭”；收租前要备“租饭”；耕种地主祖坟所在田地的农民还得准备“清明酒”；地主家婚丧喜庆时佃租农民要无偿“帮工”③；还有什么“背租”（1 担租另加 1 斗豆或 1 捆草）；“佃鸡礼”（拜年时送鸡给地主）④ 等等。

至于所谓政府的捐税更是多如牛毛。福建崇安县有专门的收捐税的警察队，在 1927 年前已征收田赋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了；铅山县有按灶征收的“灶墩税”⑤；按户收取的“户口税”、按人征收的“人丁税”、还有“牛捐”、“水碓捐”、“屠宰税”、“一厘头”（农民出外打工挑谷收 10% 的税）、“纸槽税”、“房屋税”、“门牌税”、“县积谷”（所谓县府统一管理的粮食，“用于”救济），这些少则几角大洋，多则数元，甚至连娶媳妇也得贴上“印花税”⑥；贵溪县还有“庙捐”、“盐捐”、“碓碾捐”、“石灰捐”等等。⑦ 至于官府强行推销的各种债券，数量也是极大的，仅贵溪县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十年（1912——1931 年）便先后推销过“军需公债”、“六厘公债”、“金融长期公债”、“关税库券”、“善后库券”、“监税公债”、“爱国公债”等 30 多种⑧，种类之多、数量

①《德兴革命斗争史》第 9 页。
②《铅山革命斗争史》第 5 辑第 3 页。
③《铅山革命斗争史》第 5 辑第 4 页。
④《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303 页。
⑤《崇安党史丛书》1985 年第 5 辑第 1 至 3 页。
⑥《铅山革命斗争史》第 5 辑第 5 页。
⑦《贵溪县志》内部铅印本《金融志》第 38 页。
⑧《贵溪县志·金融志》第 70 页。

之大，十分罕见，确实是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而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大小军阀无不向农民派饷派捐，如广东军阀许崇智一部在 1922 年由江西进入福州，路过崇安县城关，一次派捐 100000 大洋。①

至于碰到天灾人祸，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度荒，或者典房卖妻子，其痛苦那堪言说！正如当时所记载的那样：江西方面“各县农民所受苛捐杂税、派款拉夫、金融紊乱和豪绅压迫的痛苦，并不减于他省”②，“乐平（县）可找出六个铜元住一夜的娼妓，在余干、波阳各县可找拍卖妻子的现象。凡此种种，已充分证明了(赣)东北的农村经济,已日趋于破产。”③ 赣东北的广大民众遭受着一场前未有的劫难，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也盼望着苦难的日子早点离去。

赣东北地区经济日趋破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刻，也正是酝酿着巨大变革的时候。1922 年，方志敏同志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与赵醒农等人一起回到江西，开始传播革命火种，组织青年革命者在江西掀起了共产主义的波涛。 1925 年，方志敏回到弋阳，在弋阳高小组织了弋阳青年社，不久又组织了弋阳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 年底，邵式平、方志纯、雷夏、黄镇中等人组织了弋阳中国共产党支部；黄道、吴先民、邹秀峰、李穆等人组织了横峰县中国共产党支部，贵溪、景德镇等地也开始有了党的组织。④ 1926 年秋天，北伐军进入江西，江西的工农运动掀起一个高潮，打倒土豪劣绅，争夺地方政权，赣东北地区的农民运

①《崇安党史丛书》 1985 年第 5期第 2页。

②《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1927年 9月)》,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4 页。

③《致赣东北各县委的信（1928年 3 月)》,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18 页。

④《弋阳苏区志》第 4 页；《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见《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12页。

动飞跃地发展着。尤其是 11 月底，北伐军路经弋阳，协助当地共产党组织消灭了盘踞在芳家墩的土匪，振奋了广大民众的信心。不久，共产党掌握的农民自卫队得到了两条半枪（截了一节的枪为半条），从此有了武装。[①] 与此同时，在闽浙赣交界的崇安县，陈耿同志也筹建了中共支部，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工作。

1927 年大革命失败，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摧残，中国革命转向低潮。该年 8 月，方志敏回到了弋阳，立即与邵式平、黄道、方志纯、雷夏等人联络，积极着手恢复党组织和农民革命团体。10 月，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传到赣东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以地方暴动来夺取政权。11 月 25 日到 27 日，方志敏在弋阳窖头村召集弋阳、横峰、上饶、贵溪和铅山 5 县党员，即著名的“窖头会议”[②]，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作出了深入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定；会上成立了 5 县党委会及武装起义指挥部，并确定弋阳、横峰首先举行暴动，其他各县积极准备。

窖头会议是赣东北党组织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赣东北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武装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从窖头会议起到 12 月的一个月中，弋阳、横峰两地的农民革命团有上千个，农民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了。12 月中旬，横峰县楼底蓝家掀起抗煤捐的斗争，缴了法警的武装，弋（阳）横（峰）年关暴动正式开始了。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弋横农民没有武器弹药，没有及时筹建主力红军，年关暴动坚持了两个月，不幸夭折了。于是，赣东北革命进入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坚持在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阳）德（兴）横（峰）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①邵式平《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诞生前赣东北初期农民运动的概况》，见《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48 至 49 页。

②方志纯《赣东北革命斗争回忆》，见《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84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28 年 2 月，赣东北党领导的脱产武装——工农革命第二军第二师第十四团第一连成立了，大约有 20 到 30 支枪。同年夏，国民党对赣东北革命武装开始“搜山清剿”政策的第一次“围剿”。6 月 25 日，方志敏在弋横交界的方胜峰召开两县干部会，批判了畏敌动摇情绪，决定集中兵力击破敌人最薄弱一路战略方针，发动贵溪、德兴、玉山等地的民众，开辟新根据地。由于方胜峰会议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很快获得了金鸡山大捷，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从方胜峰会议后，赣东北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地方反动武装靖卫团的四次“围剿”，而红军也发展到 1000 余人，1929 年 8 月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团；1930 年又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同年 7 月，在乐平众埠街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下辖三个步兵团，共 6000 余人，方志敏任政委，军长是周建屏。

在红军逐渐壮大的同时，赣东北根据地也从小到大地发展着。1928 年 5 月到 6 月，弋阳、横峰两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不久，又扩大到赣东北的 8 县：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的部分地区，苏区面积扩大了 2 倍以上，人口由 10 万增加到 40 余万。① 在 1928 年 9 月到次年 2 月，闽北崇安的陈耿也先后领导了两次上梅起义。1929 年 4 月，闽北红军独立团正式建立；5 月，崇安县苏维埃诞生。形势的发展，要求赣东北地区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弋阳、横峰两个县委提出并经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批准，1929 年 2 月成立了信江特委。同年 10 月 1 日在弋阳漆工镇的湖塘召开了信江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有来自 8 个县 160 名代表参加，成立了信江苏维埃政府，选

①《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19 页。

举了方志敏为苏维埃主席①，苏维埃组织的领导系统完全建立了，这标志着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并由此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大会通过了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共 24 款，其中明确地提出了没收 1 万元以上的工厂、作坊和商店；没收豪绅地主、教堂、寺庙等财产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组织农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办理低利借贷；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等条款，从法律上奠定了赣东北苏区经济的基础。次年 3 月 20 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信江苏维埃临时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其中组织法规定信江苏维埃政府执委会下设一个秘书处和 8 个专职委员会，即内务、财政、军事、惩治反革命、人民经济、土地、教育和红色救济委员会，并规定了县苏维埃设立相应的机构②，显然，第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健全了苏维埃组织，成立专职委员会有利于各项事业的发展。

正当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李立三“左”倾路线传到了这里，它对赣东北地区局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首先，1930 年 5 月，中央派遣的唐在刚到达赣东北，他撤消了信江特委，改组为赣东北特委，并传达了中央要求赣东北苏区猛烈地扩军，然后攻打九江、截断长江、造成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的指示。于是赣东北红军猛增到 3万余人（包括调来的闽北红军主力），军费开支极其庞大。其次，攻打敌人重镇九江，造成红军主力游弋在外，根据地空虚的局面，给敌人袭击苏区造成了有利之机。红军在都昌、彭泽、湖口、波阳之间进行活动时，苏区武装力量只有少量的地方赤卫军，而敌人集中横峰、铅山、上饶、玉山、广丰 5 县靖卫团进攻苏区，上饶苏区、横峰部分苏区、闽

①《中国信江特委关于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1930 年 7 月 1 日）》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8 页。

②《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8 至 49 页、第 54至 55 页。

北苏区和铅山苏区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给根据地带来极其困难的局面。第三，撤消信江特委和信江苏维埃，改组为赣东北特委和（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一大批赣东北老同志被排挤，造成组织领导上的脱节。唐在刚到赣东北后，在赣东北特委中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铨 3人，调邵式平到中央去受训，实质上使李立三路线的力量在赣东北特委中占了优势，而这部分人刚到赣东北，对根据地的情况并不了解，除了硬性推行李立三路线外，难以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来处理赣东北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在 1930 年 8 月 1 日，撤消了信江苏维埃，改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担任主席。虽然，以方志敏为首的老同志对李立三路线作了一些斗争，使赣东北根据地没有完全推行左倾冒险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红军在都、彭、湖、波地区活动中也攻下了一些城镇，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也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现金药品，但是，与赣东北苏区受到的严重摧残相比，仍是得不偿失。赣东北苏区正遭到一场浩劫。

1930 年 11 月，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12 月，(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撤消，改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准备会（即筹备会）。① 次年 1 月，赣东北根据地在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性“围剿”后，决定扩充地方武装，裁减红军编制，整编为 4000 余人的部队，节省了军事开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财政困难局面。但是，在中央，王明路线很快取代了李立三路线，朝着更“左”的方向发展。不久，中央派万永诚（后叛变）、倪宝树（后叛变）来赣东北根据地，并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由万永诚担任书记。3 月 6 日至 8 日，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特区苏维埃政府，方志敏被选为主席。从 1 月到 4 月虽然在

①《赣东北特区苏准会通告（第一号）》，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93 页。

赣东北苏区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且万永诚也担任了书记，但是由于万永诚初到赣东北，情况不熟，而以方志敏为首的一批老苏区干部仍然保持以往斗争传统，因此取得红十军一进闽北和反第二次“围剿”的重大胜利。

正因为如此，中央认为赣东北苏区执行四中全会精神不彻底，于是，在 4 月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资格来到赣东北。7 月 17 日，曾洪易到达赣东北，他拉拢万永诚等人，改组省委，排挤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人，挑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强行推行王明路线，他提出批判所谓赣东北党内的李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和保守主义之类“错误”，实际是针对以方志敏为首的一批老苏区干部。就这样，“曾洪易到赣东北后，不到半年，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将赣东北党的工作全部否定了’①，为他全面夺取赣东北领导权的计划作了舆论准备。赣东北根据地面临着一场比李立三路线更为严重的灾难。

第二节　苏区银行成立前流通的货币

民国初年到苏区银行成立前,在赣东北地区②所属各县中,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品种之间兑换要贴水或升水，折算很为麻烦，而且某些地方流通的币种到其他地方就不能使用，妨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下面用图表形式来罗列 1911 到 1929 年之间赣东北地区各县流通的货币种类③：

①方志纯《赣东北革命斗争的回忆》，见《回忆闽浙赣苏区》第 114 页。

②本书所指的赣东北地区指原上饶地区所管辖的十四个县，现在乐平县划归景德镇市，余江、贵溪两县划归鹰潭市。

③资料来源为：《横峰县志》送审稿、《弋阳县志》送审稿、《贵溪县志》送审稿、《万年县志》1982 年内部铅印本、《波阳县志》送审稿、《玉山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婺源县志》送审稿、《铅山县志》南海出版社 1990 年版、《上饶地区金融志》稿本。《广丰县志》 1990 年铅印本无此资料。

民国初年到 1929 年上饶地区、鹰潭市、景德镇市所辖县流通币种表

币类	币种＼县	横峰县	弋阳县	德兴县	贵溪县	余江县	万年县	波阳县	余干县	玉山县	婺源县	乐平县	铅山县	广丰县	上饶县
银元类	袁头	有	有	*	有	有	有	有	*	有	有	*	有	*	有
	小头	有	有	*	有	有	*	有	有	有	有	*	有	*	有
	龙洋	有	有	*	有	有	*	有	有	有	有	*	有	*	有
	鹰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	有
	西班牙银元		有			有		有			有				
	香港银元				有			有			有		有		
	日本银元	有			有			有			有		有		
银毫类	广东银毫										有		有		
	江西银毫						有						有		
铜元	铜元	有	*	*	有	*	*	*	*	*	*	*	有	*	*
银行纸币类	中央银行券										有		有		
	中国通商银行券										有				
	中商银行券										有				
	江西裕民银行券												有		
	江西民国银行券														
	江西地方银行券														

（注：凡是＊号者都是笔者调查中已发现实物者。）

上述表格中的货币种类均根据县志所载，但是各地县志所搜集的资料并不完整，明显的误漏很多。例如，万年等县未流通小头是不可能的，很多县不记载使用铜元，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已发现了实物。一般说来，各县使用袁头、小头、龙洋、鹰洋、银毫、铜元是可以肯定的 银行纸币中，中央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江西民国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大，而且规定可以通用，而中国通商银行、江西地方银行、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则流通不广，或许有些地方不使用；另外，

1921年成立的江西银行、1922 年成立的赣省银行、1923 年成立的江西官银钱号、江西公共银行等官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各县使用的情况不可能一样，有些地方使用则可以肯定的。

各县使用的私人钱庄票、代用券是不一致的。例如，铅山县的河口镇有福利、厚大、广成、信成、聚盛、益源六家私人钱庄，发行各类花票，名目极多。这是因为河口是个商业码头，经济比较发达。而弋阳县正好相反，商品经济不发达，直到 1927 年仍无私人钱庄、银行，所有的金融业务往来都有铅山县河口镇的私人钱庄汇兑。贵溪县有申票、汉票、足宝、盐封等以银两为结算单位的票证，规格繁多，汇兑计算极为麻烦。例如申票，为九八规元，是县内大商人与上海商人结算使用的专门票据；汉票又称为汉口估平银，折算为九八六，是与鹰潭商人、武汉商人通商时使用的；银元宝称宝银，分为 50 两、100 两 盐封则是与盐商交易时使用，虽然号称“十足”，实际上成色也是不足的，兑换时仍需折算，而且比较麻烦。波阳县城有方发记、致祥、同益、义盛祥、华丰、胡慎昌、义盛、恒同记等钱庄票，票面不一，而且有银元票、铜元票的区别，各自为政。婺源县城流通中国钞业公司印制的“茶市流通券”，一般在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出产茶叶的部分地方可以流通，有些大城市的茶店中可以兑换现金；由此可见，在赣东北地区各县，货币种类极多，很多私人钱庄票并不可以通用。即使是银元，各地使用的标准币也不一样。如波阳县以袁头、小头、鹰洋为标准币，香港银元和各省铸造的银元要贴水五至六个铜元、其他银元也要贴水三四个铜元。从上述情况可以发现，赣东北地区虽然不大，但流通的货币品种之多，兑换贴水之麻烦，确实使人瞠目结舌。这种复杂的货币流通情况，势必阻碍市場商品经济的发展。

苏区革命开始到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成立前的一段时间内，苏维埃政府虽然制订了禁止私人钱庄、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准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组织农业银行”[①]的政府政纲,但并没有实施,因此原来的各种货币照常流通，原有的货币流通中的弊病仍然存在，因而同样影响到苏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在坚持革命斗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苏区民众生活等方面急需大量的现金，而在 1930 年 11 月起,苏维埃政府的收入骤减,财政拮据,因此发行纸币，统一苏区内部的货币成为当时财政金融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931 年上半年[②],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规定纸币以银元为基准，兑换比价是一比一，在苏区范围内，任何人不得改变这一比价。这是在赣东北地区货币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革命政权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货币诞生了，宣告了自清后期以来的币制混乱局面的终结，它对苏维埃革命的各项事业有着重大的作用。

在民国初年到苏维埃革命的近二十年时间内，赣东北地区还出现过大量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如前面叙及的贵溪县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七年（1911—1929 年),先后发行各种有价证券。其他各县情况也基本相似。这些名目繁多的有价证券，经常由于地方政府人事变动而难以到期兑现，实质上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搜括民财的方法，是套在广大民众身上的沉重枷锁。

苏区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不但给农民分配土地;“废除军阀地方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③],而且彻底摈弃了国民党政府滥发公债、库券等有价证券的做法，让广大苏区民众休养生息，从而使赣东北苏区的经济面目焕然一新。

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96 页。

②此时间为笔者考证的时间，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的有关内容。

③《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61 页。当时税额很轻,可参见第二章第六节有关内容。

第三节　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纸币的发行

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下简称贫民银行)的成立有一个过程。早在 1929 年 10 月召开的第一次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上，就通过了《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1930 年 3 月的第二次全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该政纲未作改动。这一政纲中明确提出“组织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①]，实际上已表达了赣东北革命至少在 1929 年 10 月就有筹办苏区自己银行的设想。正由于此，赣东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方志敏、吴先民、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在当时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紧张时刻，仍然关注着根据地的金融工作的建设，专门讨论过筹办银行问题。

据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陈显东回忆：“1930年下半年，信江苏维埃政府召开会议，研究成立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吴先民、邵式平、邵忠、宁春生、黄道等同志。会议决定成立贫苦劳动人民自己的银行——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拨给二十万资金(十六万现洋，另允许发四万钞票)，并由财政部长邵忠同志兼任行长，负责筹建贫民银行的工作。9 月在黄家源双喜家中开会筹办，共 7 个人，邵忠兼任行长，欧阳奂同志任银行经理，他是抚州人。会计是安徽省徽州人，欧阳奂带来的，当时就有 40 多岁，姓名我记不清了。我是干事。还有一个杂务是横峰铺前人。出纳是刘长庚同志。一个伙夫，是刘长庚同志带来的。由欧阳奂同志起草了一个银行章程和关于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成立的布告。这个章程和布告都是放在乐平高桥的印刷厂印的，”但是，1930 年 5 月信江苏维埃改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因此“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的牌子还没挂出来，就被改为赣东北（特区）贫民

①《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60 页。

银行,于 1930 年阳历 10月 16 日在芳家墩吴关兰(应为吴文兰,有些地方写成吴英兰,也错)家中宣告正式成立,并挂出了牌子,上面写着‘赣东北贫民银行’,从此开始了业务。’① 这段材料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有关创办贫民银行的记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时间相隔 50 年之久，因而回忆不可能没有一点错漏，不可能完全准确。下面依据其它材料对此作些分析和考订。

第一，关于信江苏维埃讨论筹办贫民银行的时间。据陈显东回忆是 1930 年下半年，而且在 9 月份之前,因为陈显东说 9 月份在黄家源双喜家已正式讨论。我们根据中共信江特委 1930 年 7 月 1 日的《中共信江特委关于信江群众斗争的经过与苏维埃的历史》② 一文可以判断:7 月 1 日之前只有‘组织农业银行’的提法,还没有考虑用‘贫民银行’一词,否则信江特委便会在文章中加以说明,这是其一。其二,7 月下旬信江特委撤消，成立赣东北特委;8月 1 日又把信江苏维埃改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因此讨论的时间不可能晚于 7 月下旬，最迟不会晚于 8 月 1 日。因此,信江苏维埃讨论筹办贫民银行的时间应在 1930 年 7 月上、中旬。

据曾经担任过闽浙赣省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同志说：“省苏维埃银行成立大概是 1931年，比商业机构要早一点。那时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苏区经济破坏殆尽，王明路线又来个全面没有，商店没有了,工厂没有了,小商店也很少,经济濒于破产,”我看情况有些严重，于是便向省苏打了个报告。方志敏同志接到我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了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了许多办法，筹建银行、建立消费合作社、苏维埃商店、工农药店、开办工厂、兴办畜牧业等等。’③ 这个回忆的错误很多，因为早在 1929 年 10 月信江工

①此根据《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内部本)第 102 页。

②参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38 至 61 页。

③ 谢 文 清 1979年 8 月 5 日回忆,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史资料》第 9册第 114 页。

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府政纲中已明确提出了兴办“农业银行”,怎么会到 1931 年再讨论筹办银行呢？事实上，谢文清自己在《闽浙赣苏区财政经济建设片断回忆》中已纠正了上述错误：“1930 年召开的信江苏维埃政府会议上，研究成立了苏维埃贫民银行。出席会议的有方志敏、邵式平、吴先民、邵忠、宁春生、黄道等同志。会后，邵忠同志在漆工镇黄家源黄双喜家筹建贫民银行。”① 显然,这一材料来源于陈显东的回忆。据吴文兰回忆，银行是从黄家源迁来的②,也证实陈显东回忆所说 1930 年的准确性。

第二，邵忠、欧阳奂等七人在黄家源讨论银行问题的时间。据陈显东所说是 9 月,而实际上应该是 7 月,晚于方志敏等人研究成立银行问题，但决不会迟于 7 月下旬，这一问题在上面已作了考证。

第三，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正式开业的时间。据陈显东回忆，由于形势变化太快，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的牌子还没有挂出来，就被改为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了。这一回忆是很正确的。因为 7 月份讨论成立信江苏维埃银行问题，但仅过了 20 天左右就换成了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的牌子了，确实变化很快。据陈显东回忆是阳历 10 月 16 日挂牌开业的。关于这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吴自权、朱德隆等人多次核实，并委托弋阳县支行的李保福等人再次核实,证明无误。李保福说：陈显东讲“我对银行成立时间是记得很清楚的。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一手搞的。当时有两个财委会，前方财委会扎在（乐平）众埠街,(赣东北)革委会也扎在众埠街。后方财委会扎在黄家源。我亲自送过公文(银行章程、布告)到众埠街革委会，由革委会拿到界首高桥石印局印。我是 10 月 13 日去的,在那里住了两晚,就把章程

①上饶地委党史办《赣东北党史通讯》第 1 期第 15 页，1984 年 1 月 3 日。
②《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史资料》第 8 册第 137 页。

布告印好了。10 月 15 日带回芳家墩和黄家源张贴，并在芳家墩号(号即寻找)银行驻扎的房子(最后确定在吴文兰家)。布告、章程上的时间也是 30 年 10 月 16 日，所以我对贫民银行成立的时间是记得很清楚的。'①

第四，关于信江苏维埃拨给贫民银行的 200000 资金问题。据陈显东回忆是 160000 现洋、另允许发 40000 钞票。需要考虑的是如下几个问题：这笔现金从哪里拨来？存放在哪里？如何支取？支取款项的用途是什么？陈显东说："二十万银行基金十六万光洋，四万钞票，这笔钱是放财委会，银行要钱到财委会去领，银行是属财委会领导的。四万元钞票是决议案上的，当时没有印钞票。'②这里解答了 200000 基金(即准备金)的来源问题、存放地点问题、支取方法问题。现金中的 160000 元是经信江苏维埃政府批准，从财委会拨来的，所欠缺的 40000 需要发行钞票弥补，但当时并没有立即印刷纸币。

财委会的现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打土豪罚款，二是红军作战的缴获；两者都是很重要的筹集资金的途径。从当时情况来看，赣东北根据地刚建立，在苏区内部和红白交界处捕捉土豪劣绅比较方便，因此罚款比较容易收取；而红军力量又有所增强，在作战中缴获便也比较多。例如在 1930 年 5 月攻下乐平鸣山煤矿，除其它物资外，筹款达 9 万元；7 月又攻下景德镇，筹款竟达 100 万元。虽然红军的缴获主要是部队本身使用，但与苏维埃也是互通有无。③因此，信江特委在 1930 年 7 月向中央报告中提到"信江每月

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史资料》第 8 册第 153 页至 154 页。《弋阳苏区志》第 98 页误为 1930 年 11 月 16 日在芳家墩吴英兰家中宣告成立。

②《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金融史资料》第 8 册第 155 页至 156 页 。

③汪明《关于十军目前军事与财政状况向中央报告》(1930 年 10 月 26 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475 页。

的数万元的收入’①,显然当时经费并不算太紧张,拨下 160000 现洋也不会太困难。

接着要讨论成立贫民银行是否要中央批准的问题。谢文清说:“贫民银行是(赣东北)特区时期,与中央苏区没有打通,联系不太密切。赣东北省时也时断时通,只是到了闽浙赣省才联系密切一些。因此,特区贫民银行成立,谈不上是否要中央批准。’② 而曾任闽浙赣省苏维埃副主席的徐大妹却有相反的看法:“信江特委时期办银行,打算印纸票(江西方言,即纸币),但真正发行纸票是赣东北时期,1931 年,”“赣东北印纸票,是报中央批准的,不批准不能印纸票’③,印纸币需要中央批准,成立银行更是要中央批准了。

谢文清所说赣东北特区时期与中央苏区没有打通,这是事实。但是,中央苏区与中央是两个概念,当时的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我们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1930 年 4 月 15 日赣东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同年 6 月 8 日信江特委向中央的报告、7 月信江特委向中央的报告等等④,而且报告中提到邵式平赴中央和丘泮林赴赣东北的事,我们还可以举出唐在刚、涂振农等人也是在 1930 年 5 月之后陆续从中央来到赣东北,显然赣东北与中央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并不是‘联系不太密切。”

徐大妹强调银行印发纸币必须由中央批准,这与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不太吻合。因为,赣东北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并不可能与和平安定环境下一样,事事都先请示汇报,然后再做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比较注重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注重军事上的反“围剿’等等,对财政经济问题并不是十分注意的。正如方志纯同志所说‘:当时苏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遇到了什

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84 页.
② 笔者 1990 年 8 月 31 日采访,见附录《闽浙赣苏区货币史资料》。
③ 笔者 1990 年 5 月 20 日采访,见附录《闽浙赣苏区货币史资料》。
④均参见《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